

# 激情之後的冷靜思考

■ 梁燕城

本刊總編輯

今年十月一日，我在天安門的觀禮台參加了國慶六十大典。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心靈觸動，因為我回中國服事十多年，始終以僕人的心態投入中國的發展，參與中國發展中的各種困難。我們文化更新研究中心及基金會的團隊，包括美、加、香港、新加坡及澳大利亞共十五位工作人員，三十多位董事，一百多位志工，十六年來從來沒有在中國賺錢或做生意，只是有一種對祖國深情，及對天地仁愛真理的體會，就義無反顧地犧牲海外很多機會，投身這段偉大的建國歷史。陶行知一句話：「帶著一顆心來，不帶走一根草」，最能代表我們的態度。想不到這些都為中國所肯定，並被邀請回去參加國慶大典。

十月一日，我們一早在六點起床，然後走出所住的北京飯店，看到門外全部停著軍隊和坦克車，許多人很興奮地拍照。那天早上，住在這個飯店的幾百人觀禮團，從地下通道過了對街，坐車去天安門。在這個時候我們看到軍隊和坦克，心中非常感慨，因為我們親歷了從一個悲痛年代的傷感進入一個輝煌的年代的歡躍。二十年前，是中國改革的最艱難時刻，海外有很多人對中國不斷批評和指責，西方列強也制裁中國。但那時我卻經歷一種對宇宙美善的神聖體會，與其在海外罵中國，不如回去同中國人在一起承擔，與同胞共同面對發展的困難，讓過去歷史上發生的悲劇變成一種新的希望。中華民族在近代的文化創傷很深，但我相信中國民族文化不會淪亡，反而會像耶穌基督一樣，在極大痛苦致死後，必能復活。我是抱著這樣一種與中國人同經痛苦，而後共同促進「中國復活」的信念回到了中國。

到了二零零九年，中國可以說完全走出了過去的苦難，成為一個開始走向富強的國家。這十六年的投身沒有白廢，我非常歡欣雀躍。

十月一日從北京飯店出發到天安門廣場，我們看到一個一個軍隊方陣排列整齊，另一邊是二十萬的年輕人，拿著各種花環參與這個國慶大典。看台上沒有座椅，我們雖然在太陽底下站了四個小時，但仍然很興奮，當各種部隊和裝備從我們面前經過時，從我對歷史和軍事的認識，中國的軍備正在追上先進國家，而且女兵方陣也帶給人一種驚喜的美。當然，重點不在軍隊，而在它後面代表不同歷史發展的方陣和花車，其中有一個代表海外華人的，讓看台上的海外華人代表都鼓掌歡呼。最後五千名小孩整齊採來，放出手中的汽球升空，奔跑至金水橋下歡呼，鴿子飛翔，響起《歌唱祖國》，全場激動，我看到旁邊不少中年嘉賓在抹眼淚。我也淚流滿臉，但不僅僅是一種國慶的激情，而是想到自己回中國服事多年，其中有長達七年時間不斷帶隊上山下鄉到農村，盡我們有限的力量資助農村孩子讀書，也到上海建民工高中。前後總計幫助有五千人左右，數百人已入大學，我們繼續資助。我雖然見過這些孩子，但都是分別在不同縣城或學校見到的，究竟五千人有多少，其實沒有具像的概念，直到這天在廣場上看到一個方陣正好是五千人，我想如果我們所資助的孩子都走出來，剛剛就能組成這樣一個方陣。看到他們，我就想到在農村中每一張單純而流淚的臉容。

五千人說多不多，說少不少，在天安門二十萬年輕人中只是一個方陣而已。在中國近億貧窮人口中，更是很少。但起碼我們曾經幫助過五千人，我們對得起這偉大歷史過程，對得很歷代先祖的血汗。曾經有一個故事，兩個人在海邊看到數十萬條魚沖到岸上，一個人跑過去很用心地把魚一條一條地撿起扔回海裏，另一人說你無法救全部的魚，這人說，我雖然無法救成千上萬的魚，但起碼能救我手中這條魚。所以，在國慶時我同許多人一起流眼淚，不但是因為中國強大而產生的激情，而且也參與了這個過程中所有的酸甜苦辣，中國終於強大了，幸好我在海外沒有鄙棄中國，而且參與了重建祖國的大時代。

典禮結束後，當我們沿著長安街走回北京飯店時，見到那些攜帶道具往回走的年輕人，臉上都是歡快的笑容，還有兩邊維持秩序的武警和保安，我都一一致謝他們，他們也很高興地回禮。在龐大的二十萬人

的國慶盛典中，他們都是小人物，但也會為自己參與了大時代的進程而驕傲和光榮，他們是無名的，但都是珍貴的，都是我們要感謝的。

看到這些年輕人，我就想到，假如在西方國家，如果要年輕人在凌晨起床到天安門，在烈日下一直站著，不停搖旗舞花，他們肯定受不了，會有很多埋怨，因為西方現今的自由主義教育，都是以自我中心主義為本進行訓練的。而中國人則有強大的民族文化認同感，故願意為整體而作出犧牲。這大概是中國人與西方人的分別吧，中國人犧牲小我，完成大我，西方卻是寧犧牲大我，也要保障個人權利。

正因中國人全心關懷民族整體復興，因此中國一開放，無數海外華人跑回來，以不同的知識、學問、財富投回中國，希望中國終有一天能站起來，不再被外國嘲笑和欺負。這千千萬萬的人投進來，歷史不一定記載，政府不一定注意到，也不一定得到什麼「好處」。但也正因為這樣一種動力，使中國比任何改革國家多了近千萬的現代化人才及無數資金，因而更快發展成功。

當一九七九年開放時，大陸東南邊陲的香港已發展成一個富裕的現代社會，也是傳承著中國歷史與文化，看到旁邊的祖國一窮二白，紛紛回國，拖著電視機或不同的電器，穿著不同的衣服，帶著現金，送給自己親人或鄉親父老，也有不少人率先投資助貧困的祖國經濟，希望以五百萬人的小富裕幫助十億人的貧窮。

在那個年代，香港火車站天天都擠著長龍，大包小包的，帶著不同的電器和財物，回來時空身，衣服和現錢都留在了中國，唯一能拿回來的，也許就是熬藥用的陶罐。香港帶頭之後，東南亞，美國，歐洲等地的華人也紛紛帶著不同的東西回國。當時很難想像現今中國大部分人已有電視機和洗衣機了。八十年代時我從台灣買了一個玩具熊給我女兒，看她很高興地笑，我就在想，假如有一天中國的每個孩子都有這玩具該多好。當九十年代我回國服事時，中國的孩子都有了玩具，電視機也很多了，我就想到假如中國的環保做好，像加拿大那樣到處有草地和樹，有非常好的居住條件，這個夢要全面實現可能還要一段時間，現在大城市中已經漸漸能看到許多好房子，周圍也種了樹和草，但還是少數人才能享受到的。

我投身在中國十幾年，是懷著卑微的情懷，我們投進來的不僅是錢財，去幫助貧困子弟教育，事實上我們錢財很少，更多的是投進學術和文化，來重建中國人的骨氣和靈魂。我們付出也不是沒有回報，當人學會彼此相愛、彼此尊重，中國人能活得更好，中國民族在文化重建中能體現出一種有道德、有良知、也尊重人權的時候，就是最好的回報。有時候一些高層人士問我有無需要在中國賺錢，他們的權力可作出幫助。我心領其好意，事實上我不做任何營利的事，因為一旦做了生意，心思和智慧便會用到生意上去了，就無法再在文化、學術、道德和倫理重建上繼續努力了。所以我放棄了所有能獲取利益的機會，只是希望祖國能更富強，中國人的精神和靈魂能夠重建，我就會十分喜樂，離世時也會十分平安，這就是心靈中的天國。

國慶的激情過去之後，我們還是要冷靜地思考，中國確實是初步地成功了，它的國民生產總值，快追到世界第二，將來追過日本的機會很大。但是，根據我多年回國的經驗，心裏很清楚，中國當前的成功，需要公平地分配給每一個同胞，這才是真正的富強，這是社會主義的均富精神。中國一九九二年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向，成為後來成功發展的基礎。當前市場經濟已初步成功，下一步須注意社會主義的公平公義特性，使貧困的人得到更大的照顧，也為他們建造希望。

中國政府多年來對弱勢群體已作了很大的努力，不過還有許多問題要解決，例如，在城市目前可以給更多貧困人士改善居住條件，如建公共廉租屋，可使民工生活安定下來。另外，教育改革，不但初中和小學免費，而且高中也須免費，貧困者可以不因為貧困而停止兒女的教育。只要兒女有機會受教育，就會有希望，有希望社會就不會動亂。

同時，還需要建立和完善人民冤屈時有聆聽的機制，目前的制度可以培養一批幹部，在每一個小城镇的地方，建立一些類似羅馬共和國的「保民官」。當年羅馬共和國是集體統治制度，非常強大，但遇到下層人民不能反映意見時，就會產生抗爭，於是政府決定從民眾中選一些人出來任「保民官」，專門聆聽人民不同意見。「保民官」沒有立法權，但有否決不符人民利益政策的權力。「保民官」制度讓羅馬共和國更強大。香港則在各區建立了民政署，專門與草根大眾溝通，且規定官員必須在百姓入門後兩分鐘即接見，回應其問題，或聽其投訴，由此建立很好的官民關係。中國雖有信訪部門，但屬行政系統，辦事有官僚氣。今須由黨方面建立溝通渠道，在每一縣城建保民官或社會和諧辦公室，專門做官民溝通工作，與地方政府沒有關係，身份獨立，直隸黨中央。這才可以舒解現代社會存在的民怨問題。中國只要解決貧富懸殊問題，解決民怨問題，腐敗問題，那麼，中國大富強年代便指日可待。